

中华大地，被称为“女子文化现象”的物事，寥寥无几。除湖南江永“女书”外，就是潮汕地区的“潮州歌册”了。像“潮州歌册”这种涵盖“民间文学”与“民间说唱”的女子文化，在全国来说，也是极少有的。

上图 潮州湘子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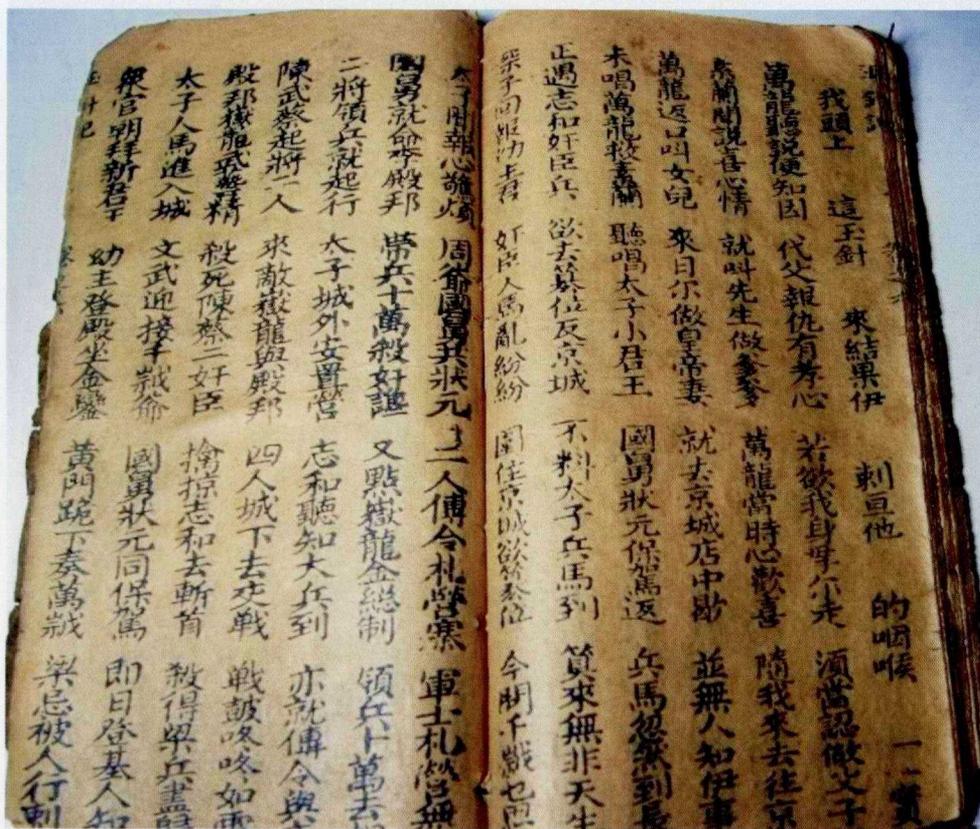
潮州歌册： 独特的女子文化

在潮州浩如烟海的地方文献中有一朵民间文学之花——潮州歌册，它如一首七言的长篇叙事诗，又如一部诗歌体小说，通俗易懂，故事性强，吸引和影响于当时的人们。作为一种自娱互乐的民间文艺活动，它流行五百多年，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很受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欢迎，它甚至有了一个“闺中文学”的别称，使得它成为潮州民间文学和民俗活动独特样式，在潮州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被定格在历史时空中的独特文化镜头

也许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潮州歌册”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历史名词。但是，仅在几十年前，唱歌册几乎就是当时潮汕民间最为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埕头、巷尾、门前、树下……到处都有人在吟唱着那动听的潮州歌册。

据老一辈的人介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不论



是在城镇巷陌，还是乡野田间，随处都可见到“潮州歌册”说唱的场面。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几乎每乡每里都有一个被称为“闲间”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让村民一边干活一边聊天的劳动室兼文化室。每当夜幕降临，村民们吃好饭洗好澡之后，就会纷纷来到这些“闲间”，谈天说地，讲古聊今，而妇女们则多喜欢聚集在一起唱潮州歌册——

天地初开草木混，百花开来五色船。
忠孝廉洁自古有，四季花木四季春。
李花开来随春开，官人抱走太子来。
秦林拿盒救真主，说起功劳是伊个。
梅花开来独占先，状元奉旨去游街。
惹得红颜相生看，可比百花五色齐。
……

如泣如诉的唱腔，曲折生动的故事，和谐健康的生活，那是一幅充满乡村情趣的动人风景画！可惜的是，如今这一切都被定格在历史的某个时空了。

近似古代的“说话”和“变文”

“潮州歌册”考其渊源及形成，很难准确界定。若根据现有材料推断，其渊源至少可以上溯至宋代。若从

潮州歌册的结构、形式、演唱、内容来看，潮州歌册近似我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说话”和“变文”。

“说话”在隋代已广泛流传，它是一种讲故事的说唱形式，一般以七言为主，每组押韵，连续同韵或转韵皆可，押的都是潮州话口语韵，浅白顺口，多用平声；也有少数段落偶尔出现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三三四句或三七句，均转用仄声押韵，韵白念诵，讲究抑扬顿挫，内容以说小说、史书、民间故事为主，表演者称“说话人”，说话的底本称“话本”。另一种叫“变文”的民间说唱，也在同一时期出现，其语言通俗易懂，内容主要演绎佛经和历史故事，本子中注有演唱要求如“吟、韵、平、侧、断”等术语。上述两种形式均为“徒歌”形式（即没有伴奏的诵唱），且属“问字寻腔”（即依字依词定腔调的高低）。

以往认为潮州歌册源于弹词，实则二者相差较远。首先弹词的表演者大多为一至三人，有伴唱，而潮州歌册却没有；弹词表演以小三弦、扬琴琵琶作伴奏，而潮州歌册则自始至终说唱，不用一板一鼓、一弦一琴伴奏。惟一相似之处是均为七言，但民间曲艺的七言体实则举目皆是。昔时潮州歌册虽有个别集子标明歌册的由



潮汕妇女在劳作中演唱歌册

来，如《宋明珠记弹词》、《隋唐演义右调弹词》，但作为潮州歌册，广集南北说唱台本甚至戏曲本子，以丰富自身的内容，这是很自然的。

潮地从唐代起，中原文化源源传入，宋代是我国说唱音乐的全面成熟传播时期，潮地在南宋期间，由于宋少帝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已成必然，这种文化与潮地土生土长俚俗文化相互融合而成歌册很有可能。若考其“潮州歌册”的结构，内容、用词、句法，就可看出它与“说话”、“变文”有共通之处。

潮州歌册的形成年代，《潮州府志》对此并没有记载，也不可能记载，因为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想入正史实无可能。据推测可能形成于明末清初，因最早的旧版歌册是清咸丰年至同治年间的刻本。据老人们的记忆，祖辈传下来的都是手抄本。若在咸丰年间发现最早的刻本，歌册形成年代按理可往前推一点。

潮州歌册最有“潮”味

知名潮籍作家林英群先生认为，在姓“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潮剧、潮州歌谣、潮州木雕、潮州剪

纸、潮州音乐等，潮州歌册是最有资格姓“潮”的文化形式。“因为戏曲、剪纸、音乐等在其他地方都有，但唯独歌册这东西只有潮州有，更主要的是潮州歌册的创作者都是专为讲潮州话、识字不多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劳动妇女‘量身定做’而创作的，所用的文字和语言都是用她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来编写，无论是用词还是语法，都彻底地姓‘潮’。”2008年，潮州歌册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潮州歌册”被认为是俚俗文学，文人学士不愿涉足其间，民间素材均为劳动妇女自己提供，成为“歌册”的原始作者。此举感动了穷秀才们、潮剧艺人们、行铺财东们，在他们的支持下，把流传在潮汕妇女中的民间故事、地方传说、神话故事，编成册子。如饶平潮剧艺人林炳福编写的《柴房会》、《英台行嫁》，潮安浮洋潮剧艺人洪舜编写的《刘龙图骑竹马歌》、潮州市秀才柯逸士写的《曹翠娥传》、余芝伯写的《三义女》、揭阳失明艺人孙耀存写的《车田案》等等。这种歌册更具浓烈的地方色彩，它运用了大量的俚俗乡语，

广受劳动妇女的欢迎。

从潮州歌册的现存歌目来看，有改编和创作两大类。前者有《薛仁贵征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后者多以当地民间故事或地方发生的事件为创作题材，如《金花牧羊》、《陈三五娘》、《苏六娘》等。此外还有科普知识的内容，如《百鸟名》、《百花名》、《百屏灯》，也有革命题材的如《红珊瑚》、《白毛女》、《红灯记》等。

潮州歌册造就妇女品格

早时潮汕妇女，能上学堂的很少，许多见识如道德规范、品性、情操、为人处世、是非原则、善恶观念等，都是从潮州歌册学来的。虽然历史上潮州歌册多为宣传忠义节烈和佛教思想，有渲染一夫多妻、奴为主死等等糟粕思想，但也有主张婚姻自主、讴歌爱情、抨击世态炎凉、颂扬巾帼英雄等思想，其文化内涵还是相当丰富的。

在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歌册毕竟是开拓妇女眼界，揭示妇女心灵，让她们有机会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关注命运，从更多层面来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的启蒙学。作为一种女子文化，潮州歌册的内容主线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寄托了人民的善良愿望与美好追求，蕴含着潮地历史文化，在纯朴、真挚、通俗、生动的语言中，普遍存在温厚纯良、仁慈宽恕的传统文化底蕴，形成历史上潮地广大妇女贤淑、温柔的品性，从这一点来看，其深远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辛亥革命之后，潮州歌册的内容，注入了不少反封建、号召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新内容，使温柔纯良的潮地妇女，进一步认识了人生的价值。早时妇女出嫁或随夫漂洋过海谋生，嫁妆与行囊中，一定要带上几本心爱的歌册作为闺房文宝，寄情以传乡音。在海外的潮人不少幼时携带潮州歌册走了，长大了一听潮州歌册，乡情油然而生，到老时有时想起，更为潮州歌册中的悲苦人物与故事落泪。有的阿婆是朗唱潮州歌册的能手，一生中不是只识一二部，而是能唱十数部。大多妇女，可以不用手执歌册，光凭记忆，也能滔滔不绝背唱出来。不少妇女、小孩和一些得不到正规教育的人，就以歌册来学文化、学知识、明事理……

多元文化让潮州歌册日渐式微

潮州歌册之说唱者多非专业艺人，而是家庭妇女，

无须乐器伴奏，也不在什么书场，只要稍为宽裕的地方，如闺房、庭院、厅堂，以至绣花、积苎的场所，谷埕、树下，随处可以聚集三五人、十数人，一人唱歌册而众人听之，是潮汕地区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

然而，在文化日趋多元的今天，我们已经再也难以看到昔日吟唱潮州歌册的动人情景了。

为什么会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文化界的有关专家指出，这与今昔两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旧时代的潮汕妇女一般不外出抛头露面，大都在家里或到邻居家织麻绣花或做针线活。在社会信息闭塞的生活环境中，她们通过听唱歌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扩大眼界，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潮州歌册是潮汕妇女的生活教科书，也是她们学习文化知识的课本，空闲娱乐的精神乐园。”

“而现在，看看我们的身边，娱乐的方式可谓丰富多彩，听流行音乐、看电视电影、玩网络游戏、唱卡拉OK、上网聊天冲浪、参加体育活动，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空间。加上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很快，许多人除了工作、家务和必要的休息，几乎都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去进行娱乐，更别说一群人凑在一起唱歌册了。”

这就是潮州歌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最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潮州歌册的存本的日渐消失。

据介绍，潮州歌册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大约是清朝末年，当时有李万利、王生记、陈财利堂、瑞元堂等多家出版社，其中尤以李万利号历时最久，据说始于清咸丰年间。这些采用木刻版印刷的歌册，发行及留传遍及粤、闽、台、港、澳以及南洋各地，有不少人家嫁女儿还用潮州歌册作为陪嫁礼品。但是，如今这些歌册大部分已经失传，只有部分图书馆、档案馆尚有少量存档。

而谈到潮州歌册的传承人，数量就更加少了。“如今40岁以下的人基本都不会唱潮州歌册，40岁以上的也只能记得少数歌册，甚至就连《百屏灯》这些以前几乎人人都会唱的歌册，现在也没有几个人能唱完整。”

面对潮州歌册日渐失传的现实，文艺界加大了保护和传承的力度。通过不懈的努力，潮州歌册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并加大了收集和整理力度，我们应该为传承和发展潮州歌册贡献自己的力量。■（据潮州日报等资料整理）